

臺灣社會學刊，2009年6月
第42期，頁199-210

評 論

駁雜的認同，幽微的文心：

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

2008，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陳建忠

陳建忠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chicchen@mx.nthu.edu.tw）。

Chien-Chu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蕭阿勤教授（以下敬稱略，僅稱作者）的專著雖然出版不久，但，書中結集的論文因係過去數年來陸續發表的篇章，經常被很多論者引述，相關的評論亦所在多有。關於本書的整體評價，筆者必須先予以肯定的是：作者以媲美史家考證、梳理文學史實的功力，對一九七、八〇年代台灣文學場域重新加以建構與評價。作者運用知識社會學與敘事理論建立起處理集體記憶的方法論（詳見書中第一章），再以台灣文學史與社會運動史為對象，將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其中一部份人，如何由中國認同轉為台灣認同，並藉由重新詮釋歷史的方式，來建構合乎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認同的文學史敘事。

與此同時，筆者更觀察到，本書作者的論斷，已被視為某種解釋台灣文學史的代表性觀點，其影響力正在持續擴大中。例如，馬來西亞籍的學者黃錦樹，在一篇回應短文裡，以〈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與解釋的策略〉為題，論及通過蕭阿勤的研究可以理解本土大老葉石濤屢次轉向或覺醒，所顯示出來的「昨是今非」；黃更進一步引伸認為，類似的思維也展現在體制化後的台灣文學系所，在本土論典範指導下，「不斷重述既有的受傷者敘事」（《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9，頁131-135）。

筆者因此必須強調，本書這種合乎認同敘事理論規定的「文學世代改宗（conversion）說」之歷史推演，存在著將世代認同描述為一個具同質性的現象，而有意無意地滑落了一些關鍵性環節，缺乏同樣充分的闡述。於是就出現讓上述讀者「可能」偏讀或誤讀的機會，而不免稍稍減弱本書研究成果的解釋力道，這當非作者所願。

由於筆者的專業領域並非社會學，而是比較熟悉台灣文學史的研究者，本文目的不在完全符合社會學界的書評形式，而是誠意地提供一種閱讀心得。以下，筆者要採取補充論證的方式作為回應，提出幾點可以

進一步解釋的環節，就教於方家。期待能讓本書所提出的豐富議題，有被充分討論其意義的機會。

一、被壓迫者的名字由誰決定？從台籍作家認同的複雜性到殖民地社會研究的倫理學思索

本書中，由龐大資料仔細整理出來的台灣作家心路歷程之描述，和理論闡釋一樣，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學術成果。這些台灣作家，以葉石濤等聚集在《台灣文藝》與《笠》詩刊的作家為主，被詮釋為從中國認同轉向台灣認同過程中，修正自己有關認同狀態的歷史敘事，以符合當前的認同需要。就中，作者不僅處理七〇年代「軸心世代」的認同變遷，還一併解釋較早世代的作家如何參與這項轉變。

在此，筆者需引述一段書中的精簡結論，說明作者的文學史觀察。在第三章裡，作者認為美麗島事件後，進入八〇年代，因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動員，原先參與政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不深的本省籍作家，以「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出發，捨棄原先的「中國影響說」與「文學支流說」，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歷史重新敘述為：

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作家是基於台灣主體意識而創作，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是貢獻於台灣民族的形成、追求台灣民族解放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也不是中國文學。（頁194）

這種精簡結論雖是作者自己給出的，但易於辨識，應相當具有代表

性。當這樣的「世代改宗說」在本書高度專業性的理論建構後，已成爲一種更科學性、更模式性，但也更易於被運用的文學史觀。

然則，一個明顯需要特別解釋的環節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雖然從民間出發，但卻未在國家文化體制內形成決定性的影響。二〇〇八年政黨輪替後，當中學國文教科書的編纂仍糾結在加回一、兩課文言文課文，《論語》、《孟子》改回必修或必選修時，反撲的「絕不改宗」之文化擁護者，更像真正永不退場而始終占據結構性主導力的民族主義者。故此，當我們看到書中特別羅列台灣民族主義者如何被陳水扁政府禮遇的大串名單，連筆者服務的台文所也是新政權下的特殊產物，彷彿他們都是一夕之間才具有被重視的價值，而遠非價值的重返（頁256-259）。這活生生的權力運作現況，讓人深感二、三十年來所謂的文學史敘事重寫，顯得如此毫無重量可言。

因此，筆者對本書首先要補充的意見，乃在於提醒關於敘事研究與國族認同政治的探討，是否能涉入到同時關注「現實」層面中行動者的真正感受與生存狀態？更有甚者，關於被壓迫者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是否更存在著倫理學層次的理論反思空間？所以，當現實境遇裡「台灣民族史觀」缺乏實際政策影響力之餘，或更顯示在看似「鐵證如山」的改宗事實前，這種台灣國族敘事的「策略性」應用恐怕更大於實質影響的事實。

但同樣要補充說明的是，軸心世代雖受到強大的中國化教育，他們的改宗敘事無論經過何種考量，或者修正了自己的形象，或者虛構了歷史記憶，這部分自當需要一一加以歸位與批判。不過，日治下的皇民化世代（即周婉窈教授研究的對象），他們的認同狀態，或更可稱之爲「狡猾的順服」（sly civility），當中所顯示的認同之模稜兩可（ambivalence），有可能因爲曖昧難明而被簡化。面對這種歷史處境，

一個立足於殖民地經驗上的台灣研究者，如何發展台灣學術研究的「後殖民立場」（postcolonial standpoint），而避免滑向任一單邊民族主義立場進行討論，應該是值得參酌的思考方向。

循此而論，當我們重新思考台籍作家的現實處境，以及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話語的實際影響力，解讀史料時或許會有不同的重點取捨。

例如，當作者以日據作家如葉石濤、王詩琅、吳瀛濤、黃得時四人在一九七〇年代前戰後對日據文學的總結發言，認為他們都突出日據文學「抗日」的特質，「這些文學上的抗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亦即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在文學上的抗日，是以做為中國人的認同意識出發，而以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回歸中國的統治為目標」（頁154）。從而，他認為，包括葉石濤在內，當他們公開回答「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是什麼？對現在的『我們』意味著什麼？」等問題時：

基本上與戰後台灣社會公共領域中國國民黨所建構、容許的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模式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們可以說，他們事實上接受了這種歷史敘事，也以此來回顧、理解他們曾親身經歷的過去。（頁155）

但，當我們仔細回顧六〇年代葉氏的論法，其重點在指出鄉土文學優美、光輝的傳統不能丟掉。在復出後第一篇評論〈台灣的鄉土文學〉（1965）當中，他便說想寫一本省籍作家的「鄉土文學史」，並強調其特殊性。但，這被迫蟄伏十多年復出後的重要文章，葉石濤駁雜認同下的幽微文心猶恐被遺落在表面化供述的中國認同裡。作者重新拼貼葉氏的文字，解讀重點認為台灣本省籍作家最終目標在於「自然地融化在中國文學裡」，至於「更進一步地努力形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翼」這句話似

乎在無意中被遺落（頁153）。經過這種遺落，「特殊性」就相對不再重要。葉石濤當然曾經有中國認同，但他對中國認同中暴力性質的質疑，以及轉換成台灣認同的可欲性，似乎還有待辯證性地討論。

二、模式或傾向，整體或個體：解讀文學作品與文學史觀的差異路徑

其次，筆者想對通過社會學的學科知識，來歸結出文學史世代特徵的模式化（mode）與整體化（totality）的作法，提出方法論上的補充。筆者認為，文學研究者以文本解讀為主的討論，與社會學家在研究取徑上追求的目標不同，呈現的觀察也不同，但這並非不能並存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以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及後續的歷史重述為對象的討論裡，作者主要提出的觀點認為：《台灣文藝》與《笠》的成員，在八〇年代後修改他們在鄉土文學運動中的表現之敘事，「他們也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本省籍作家作品在直接促動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潮流上幾乎沒有扮演什麼角色的事實，而籠統地把他們描述成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源頭」（頁242-243）。這基本上顯示了作者可能較接近呂正惠等論者對鄉土派的歷史描述，認為與國民黨直接交鋒的左翼鄉土派才是七〇年代的主角；但本土派當時則是緘默無聲。也因這種認定，作者幾乎都由改宗的角度來描述，以證明認同與修正歷史敘事乃正相關之理論。以下這段歸納也相當簡鍊，但同樣足以顯示作者模式化與整體化的研究取徑下，如何把握文學史實：

在《笠》與《台文》成員的「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

中，「台灣人」逐漸被建構為歷史上一連串外來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台灣文學則被描述為反映台灣人這種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頁244-245）

筆者完全認可書中對這般修改歷史敘述方式的討論後所說的：「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使民族主義者對過去的建構卻也經常是非歷史、甚或是反歷史的」（頁255）。所以，筆者當然不同意「反歷史」的敘事方式。但，被殖民者與被壓迫者究竟要如何才具有自由意志下敘述歷史的空間？如果換個角度問，左翼鄉土派之反黨國體制為何具有公開發言的可能性，而歷經日本與中國統治的台籍作家卻必然要被形容為「幾乎沒有扮演什麼角色」？

筆者以為此處需要補充解釋的環節在於：除了在文學史觀的探討外，必須同時重視「文學作品」中複雜認同狀態的呈現。換言之，台籍作家並非沒有在七〇年代發聲，而是他們的創作既不反美帝、日帝，又不反獨裁，且不強調一統中國，而竟是在訴說他們對土地、人性與自主的渴望。筆者願意特別指出由鍾肇政自一九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創作的「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也可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納入）為例，說明文學文本研究的取徑所強調的契入作者的認同「傾向」，以及重視作者之為「個體」在不同媒介上可能開發出來的自我再現方式，或許能在強調模式與整體把握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外，提供另一副認識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眼鏡。

「大河小說」（Roman-fleuve）一語實源自法國文學，多寫家族史，且以長篇巨帙得名。我們可以注意，葉石濤當年首度提出「大河小說」來談論鍾肇政作品，是在六〇年代中葉。當時，政治上是戒嚴時

代，而被葉石濤寄予厚望的鍾肇政首部曲《台灣人》，在《公論報》只連載一天便被停刊；幾經波折，方改名為「台灣人三部曲」之第一部《沉淪》，轉移到《台灣日報》副刊刊載。

把大河小說過度解讀以符合解嚴後高漲的國族主義認同，是對土地認同與文化本質過於固著，這並不完全符合戒嚴時期創作小說的實質意涵。但，這樣的長篇歷史小說，不是要贖回中國史，而是贖回不能在公共領域談論的台灣史。即便文本並非宣揚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但，卻也絕非表面所呈現亦步亦趨複誦效忠國家的口號而已。

事實上，當年葉石濤與鍾肇政私人的通信書簡中（這或許是不少先前回應者所謂的「隱蔽腳本」〔hidden transcript〕），便提及「大河小說」的概念，並期許鍾「以使徒的精神為確立台灣文學而盡職」。他依然兼顧台灣性與世界性的方向，談論台灣大河小說。

鍾肇政也曾如此回應評論者批評他在《插天山之歌》當中，為何設計讓主角毫無作為的躲藏與逃跑。如今看來，這種怯懦的跑，容或不該在事後詮釋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但至少是一種真實的殖民地台灣作家的曲折抵抗方式吧！（參〈台灣文學十講〉，《鍾肇政全集》卷三十，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02，頁333-334）

同樣寫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出現前，七〇年代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之《孤燈》，描寫被日軍徵用而遠在南洋的明基，在戰爭末期逃亡中，意識到母親燈妹就像隨時與他同在，並不時可聞到屬於燈妹的那股母親的味道：「阿媽，就是台灣，就是故鄉，就是蕃仔林；蕃仔林，故鄉，台灣，也是一種阿媽」。在此，李喬藉由明基的想法，將燈妹與土地、生命詮釋為一體。「台灣認同」，而非「台灣民族認同」，也已是活生生躍動在文本中的敘事。

因此，若我們不要急於跨入八〇年代那樣修改歷史敘事的複雜情

境，再將焦點挪回早幾年評價大河小說的葉石濤身上。讓我們再端詳一下這幕情景：七〇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泛）鄉土派在對抗官方右翼民族主義對鄉土文學指其有「工農兵文學」嫌疑時，陳映真還必須分身寫〈鄉土文學的盲點〉來「關切」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因為，葉石濤在這篇文章裡，除了一貫強調中國的普遍性外，又把鄉土文學具有的特殊性，在人文風土之外，加上具有主導思想意義的「台灣意識」。於是，事後返觀，「鄉論」中被夾擊的似乎是具有高度「台灣意識」的省籍作家。因為省籍作家既要避免「太」關心鄉土被說有社會主義思想，也要避免「只」關心鄉土被陳映真說成具有分離主義思想。

文學文本的分析，正因為其隱喻與意象的光影交錯，或許反而使我們更能細緻看到在表面的中國認同表態外，文章肌理中閃現之台灣意識。當然，筆者絕不贊成「反歷史」地將之詮釋為台灣民族主義。但這種個體認同情狀與曖昧傾向之分析，是筆者多年來研究殖民地作家感受最深刻的曖昧美學。如此，或可體會那些戒嚴時代認同駁雜的台灣作家，竟是讓瘋狂的殖民痛史刺傷他們成詩，使他們將駁雜的認同潛藏在幽微的文心之中——以中國之名。

三、結語：國族歷史敘事裡的愛與死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少數人的想像？或是集體的想像？台灣人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感受，去說出自己別於中國認同的經驗嗎？那是改宗嗎？用「中國人」這個名詞，而實際上湧動著的是混沌的台灣人認同狀態，會是社會學上可以捕捉的模式嗎？文學表現的曖昧性，卻讓筆者看到這種混沌與矛盾之必然與缺乏被理解。

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絕對晚於台灣人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而存在。如果晚生的民族主義者不免於遭受父祖之國對改宗與變造歷史的質疑，那麼，即便筆者不支持反歷史的民族敘事策略，但更願意悲憫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敘事的歷史成因（吳叡人教授對「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的闡釋可以補筆者此處論證之不足）。當我們以科學之名來討論為何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為何背棄中國之名時，更具有強制性影響力的中國之名如何被建構起來，如何弭平所有族群、階級或性別的差異敘事，或許也該在同一論述平面上被同樣的展開（沈松僑教授關於「黃帝神話」、「西北旅行書寫」與「內部殖民」的歷史研究可為典範）。這樣，我們才能「同時」看到：如果有人不得不去編造自己的過去，那是因為有人總要去編織別人的未來。

通過本書的闡述，我們對於民族認同如何藉由敘事以發明「國族」，將有深刻的理解。然而，筆者由本書得到更多思考的，則是不僅體認到把「歷史」從國族的宰制下拯救出來絕對有其必要性，更要在指出行動者「昨是今非」的歷史敘事之同時，勇於面向那內化於我們體內，相形之下更巨大而結構性的民族歷史敘事，加以凝視與批判，則那攸關的將不只是正義的實現，更是一個知識展演的倫理學問題。如果國族敘事勢不能免，如果敘事總是建構，那麼，我們更要看到那建構的虛妄性與暴力性，從而看到國族敘事是如何把對國族的愛建立在他者歷史的死滅與遺忘之上。而研究與理解這過程，或將讓我們更謙卑地面對自己正在建構的歷史，與避免無視於弱勢他者的歷史。

作者簡介

陳建忠，台灣嘉義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近年研究重點在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香港文學的比較研究方面。曾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著作有《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春暉）、《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五南）、《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五南）、《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晨星）。

參考書目

- 吳介民，2004，〈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頁299-355，收錄於李丁讚等著，《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吳叡人，2008，〈吳叡人談進步本土主義〉。「Zeitgeist | 時代精神」部落格<http://zgeist.wordpress.com>，取用日期：2009年6月22日。
- 沈松橋，2006，〈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37: 145-216。
- 陳建忠，2009，〈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大河小說」的命名、詮釋與葉石濤的文學評論〉。《文學台灣》70: 307-333。
- 黃錦樹，2005，〈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與解釋的策略〉。《文化研究》創刊號。頁131-135。
- 葉石濤，2008，《葉石濤全集》。台南：台灣文學館、高雄：高市文化局。
- 鍾肇政，2002，〈台灣文學十講〉。《鍾肇政全集》卷三十，桃園：桃園縣文化局。